

为什么拉康不是海德格尔主义者¹

作者：齐泽克 本文翻译：沧海

海德格尔是主体性批判在哲学上的主要拥护者，在 1950S 之前，也是拉康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因此，澄清拉康为何会从认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我思”的批判是佛洛伊德对主体去中心化的一个翻版，转变到悖论性并且反直觉地把我思作为主体的无意识就变成了一件足够重要的事。

拉康的理论的起点是佛洛伊德关于“Bejahung。”的一个原始概念，决断，作为“排除”（英文常常翻译为“FORECLOSURE”）的反义词。拉康把 Bejahung 当作为一种原始的象征化，用以反对海德格尔把语言存在作为存在的“去蔽”的展开的观点。但是如果仅仅这样，事情会迅速变得复杂起来。如果我们回头看，在佛洛伊德那里，其实有四种“VER+”的词汇：Verwerfung（foreclose/rejection）“弃绝”，Verdrängung（repression）“压抑”，Verneinung（denial）“背弃”，Verleugnung（disavowal）“否定”。在“排除”

（Verwerfung）² 中，内容被抛出象征界，被去象征化，所以它只能在实在界中回归（并且在幻像的伪装下）。在压抑中，内容仍然保留在象征界，但是并不能通达意识，被放置在另一个场景之中，只能在征兆中回归。在背弃中，内容是通达意识的，但是被“denail”所标记。在否定中，它以积极的形式出场，但是只在绝缘的条件下一它的象征界的一面总是被“推迟”，它并没有真正过度到主体的象征宇宙。且以“母亲”这个能指为例，如果它被弃绝（Verwerfung），那么它将会失去在主体象征宇宙内的位置。如果它被压抑（Verdrängung），那么它会在征兆的根据中形成。如果它被背弃（Verneinung），那么我们将得到目前十分熟悉的形式：“无论我梦中的那个女人是谁，她都不会是我的母亲”。如果它被否定（Verleugnung），那么主体将会平静地谈论他的母亲，并且会始终让步（“当然，她是我的母亲！”），但始终不会被这种通行的方面所影响。很容易看出，（这四个词汇的变化里）其中拒绝的程度不断缩小，从完全的排除（完全不出场），到被压抑（在象征界中回归，但不进入意识），再到被背弃（被拒绝的内容可以进入意识），最终到一种委婉的否定，主体完全可以不带否定色彩的谈论那个名义上被否定的东西。

所有这四种形式都已经预设了象征秩序的在场，并且它们都关注那些内容如何与象征秩序相关。因此，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更激进的“先验”问题，即否定性问题，它组建了象征界本身。被佛洛伊德称为“原初压抑”的那个东西能成为这个角色的候选吗？原初压抑，并不是进入无意识的带有内容的潜抑，而是无意识的构成力量，是创造了无意识的真正空间的那个姿态（gesture），是横亘在意识/潜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鸿沟。这里我们必须迈出小心翼翼的一步¹：无意识之我的这个原初分离，衍生了所有个标准的反笛卡尔主义的类型（我不在我思之处），但这个分离不应该被仅仅视为是“我”与无意识实体的分离，以至于我察觉到我真正的“在”是外在于我的，是不被我所抓住的。拉康的黑格尔主义的教诲就是，去中心化总是加倍的：当主体发现自己是去中心化的、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真正的“在”时，就意味着大他者——这一主体存在的去中心化的场所本身就是去中心化的、残缺的，它本就缺乏那个能保障自己一致性的不可见的超验之物——X。换句话说，当主体是去中心化的时候，他的真正的“在”并不是自然实体，相反，是大他者、是那个围绕匮乏建构自身的虚拟象征秩序、是那个“第二自然”。主体在大他者内部的分离的原因就是它同

1 本文选自齐泽克：《少于无》第十三章，译者建议本文配合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第二章第二个小标题“从征兆到症候”一起阅读。

2 这四个词我并没有找到合适并准确中文翻译-----译者注

时是大他者在它核心之处²³它自身的分离。这两种匮乏的重叠正是造成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Ausstossung*”（排除）（实在界的不在场由象征秩序的出场构成）和“*Verwerfung*”（一个能指从象征界到实在界的“被取消的赎回权”（*foreclosure*）¹）模棱两可的原因——有时候二者相同，有时候二者相异。对于这个问题，François Balmès 做了合适的观察：

“如果 *Ausstossung* 是我们所说的那样，它与 *Verwerfung* 完全不同，它远不是精神病的固有机制，而是大他者场域的打开。在某种意义上，它不是被象征界抛弃，而是被自身的符号化所抗拒。这里我们不应该考虑精神病和幻象，而应该考虑主体本身。临床上，与之符合的事实是，这种去赎（回归到实在界）并不能阻止精神病人继续活在（*dwell*）语言里。”

2

这个结论是一系列严格问题的成果。事实是，精神病人可以言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确实活在语言之中：“去赎”并不意味着他们被排除在语言之外，而是意味着，他们在象征宇宙中关键能指的符号功能的宕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能指被排除，那么它必须已经就在能指秩序之中。对于弗洛伊德和拉康来说，*Verwerfung* 的含义与 *Bejahung*（在象征宇宙承认自己位置的主体的原初姿态，即“*affirmation*”）完全相反，Balmès 的解决方案是将“*Bejahung*”和对实在界的某种更原初（初级）的符号化加以区分，它是实在界和象征界的准神话般的最原初的直接连接，并和它们差异的时刻一同产生，它是象征界诞生的进程，并伴随着能指运作的原初能量（*battery*）的出现，也主要就表现在前符号化的实在界的排除。当狼人（*wolfman*）一岁时，他看见父母交媾的场景，这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痕迹：它被象征化了，但只作为性欲的痕迹而被保存。只有在三年多过后，当狼人的性幻想开始被唤醒并且开始好奇孩子们到底从何而来之后，这条线索才真正被历史化，并在他的个人叙事中被激活，成为他在意义宇宙中定位自己的一种方法。精神病人在这里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步，他们开始栖居于象征秩序；而他们并不能主体化地或者执行性地参与语言来历史化自己的主观进程——简而言之，完成 *Bejahung*。

正如 Balmès 敏锐地察觉到的一样，因为如此，匮乏发生在精神病的不同阶段：精神病人能继续居住在充满意蕴的原初的丰满（母亲那样的）的大他者场域，他们不认为象征阉割是真正的“失去”，相反，他们认为这本身是解放性的、给予的、生产性的，这使事物成为了有意义的存在；对于他们，失去只能是纯粹的剥夺、是被剥夺了什么问题。

在这冒险的一步中，拉康将“原初”符号化——它对于精神病人是可接近的，并且优先于他们所缺失的主体性的参与——和海德格尔联系起来：作为存在的绽开/去蔽（*disclosure*）的语言的原初维度，和作为表达的、言说的维度或者说主体间性的认同的一种方法之间的差异。在这个作为澄明的投射的原初命名当中，意义（*signification*）与指称（*reference*）的差异消失了，命名事物的一个词并不“意味”着它，它在它的存在中，构成了或者绽开（*discloses*）了，并使得它的存在的空间真正被打开。这个层次就是表象自身的层次，它并不是相反于在表象之下的那个实在的表象，而是纯粹的显现，是完整的显现，在它之下，其实什么也不存在。在关于精神病的一期研讨会上，拉康提供了关于纯粹表象及其伴随物和这种形而上学的诱惑的很好的描述，以把它还原到它的基础、它的隐藏原因：

1 本文将之译为“去赎”——译者注

2 François Balmès, *Dieu, le sexe et la vérité*, Ramonville Saint - Agne: Érès 2007, p. 81-----原文注

“彩虹，它只是它。就是因为它，所以我们会倾尽我们一生之力去了解它背后的东西，以及我们能够还原它的原因。请注意，来自最开始流星与彩虹的特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我们称之为流星，正是因为它的背后没有任何隐藏的东西。它完全在这个表象中。让我们坚持它的，以至于不断向它提出问题的，仅仅是由于它的起源，也就是说，犹豫它被命名为彩虹。除去这个，再没有别的了。”¹

在这个“宣告”的内在的反射性时刻（内容的每一次交流事实上都同时地如其本来地“宣告自身”）就是被海德格尔指认为能够区分确切的人类的维度的那个“如其本来”：动物能感知石头，但是它不会“如其本来”地感知那个石头。这就是能指的反射性：每一个话语不仅仅传达内容，同时更决定了主体如何陈述这个内容（在德国观念论里，意味着每一个意识都已经事先是自我意识）。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精神病不仅仅是“无世界”（welt - los）的，他们更居住在了存在的开端。

然而就像拉康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种解读往往伴随着它的（不对称的，真实的）反面：通过某种解读，能把精神病人指认为一种更高层次的象征化，并把随着更低层次的符号化的脱离。就如同，拉康在弗洛伊德那里读到的“物的表征化”（Sach - Vorstellungen）和“词的表征化”（Wort - Vorstellungen）之间的区别，作为象征秩序内部的间隔——原初符号化，这一原初无意识的能指能量的激发（在早期精神分析里，被佛洛伊德表述为“记忆痕迹”（memory - traces, ）和次级符号化（语言的前意识/意识系统）之间的区别。这其实为他（拉康）提供了一个对精神病者的窘境的悖论性定义：一个精神病人并没有退化到一个更为原始的对于物的表征，或者通常地说：“像对待物一样对待词”，相反，他们恰恰能精确地处理词语表征，即使没有对于物的表征。换句话说，精神病人可以正确地使用语言，但是他缺乏那个能够给予我们使用的词语力比多共鸣的无意识背景和他们特定的主体性的权重与色彩。没有这一背景的存在，精神分析的解释是无力且无效的：“在精神病中，真理是没有效果的但这并不妨碍精神病人比其他人更好地道出它。”这也是我们理解拉康那个古怪主张的一种方式——正常是一种精神病：我们对语言的寻常定义是：语言是一个人造的次级符号系统，它被用来传达那个已经预先在场的信息等等——但这个定义忽略了一个主体性参与的潜在层面——表达的维度；精神病的悖论就在于他是唯一能完美适用这个定义的群体，就是说，他们真地把语言当作一个有效的中立次要工具，但事实上，这个工具却与言说者的存在完全无关。

特定的一些能指并不参与无意识的书写，这就是精神分析中父之名（paternal signifier）的情况。这并不排除他们在前意识层次的存在——正如我们看到，某些能指在精神病中被排除，但是仍然在语言中被主体操纵。

这种振荡似乎暗示着，对于原初符号化和 Bejahung/Verwerfung 区分似乎并不完美。（依赖于区分不同层次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先天地受质疑）它所遗漏的是象征界的基础悖论：最终，象征界将实在界的排除和对于能指重叠的拒斥似乎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在象征的大他者中，外在和内在的限制其实是一致的，如果实在界是自我脱离的、本身就是去中心的、自身不一致的，那么象征秩序只有脱离了实在界才能出现，因此，没有 Verwerfung 就没有 Ausstossung——象征秩序为了从实在界抽身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它自身的残缺（being - truncated）。这就是拉康的那句格言“不存在大他者，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的真正含义——就如晚期拉康十分清楚的那样，这意味着我们在最低限度上，都是精神病人。但是，这里应该被表达的更加清楚：那个被取消赎回权的能指不仅仅是一个错失，一个匮乏，它作为能指更意味着被禁止的客体 A（barred A），能指本身的匮乏，和象征场域的不完整和不一致。精神病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居住在一个自身残缺的象征秩序，相反，他恰恰居住在一个“整全”的大他者，一个缺乏那个铭刻这自身匮乏的大他者。

这就是为什么不需要去假设两个阶段，先是原初符号化，通过排除实在界能指获得原初能量，然后是一个能指的排除：当或者说如果，那个代表并登记了大他者内在不一致性和非全的能指被排除后，这两个阶段是同一的，而精神病紧随其后，位于次生的阶段。但这种双面的原初 *Ausstossung* 必须和那个驱逐外国入侵者的暴力的防守手段相区分，甚至包括那个声明狼藉的《*Juden raus!*》（犹太人，滚蛋！）¹，在今天这个高度敏感的社会里，驱逐会以他的各种暴行再现。

黑格尔对我们当今生活的全球性的反身化-媒介化（*reflexivization - mediatization*）的教训是——这个过程就已经产生了它自己残酷的即时性——这被艾蒂安·巴里巴（*Etienne Balibar*）很好的把握到了，主要表现在他“作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的过度的无功能性的残酷”的概念上。这种残忍，从“原教旨主义”的种族主义/宗教屠杀到发生在我们城市中的青少年对无家可归者所做的无意义的暴力，这种暴力被称为“本我-邪恶”（*Id - Evil*），并且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或者功利主义的理由。所有关于什么外国人偷走我们的工作，或者什么对于西方价值的造成的威胁的陈词滥调，都不应该（能够）蒙蔽我们：在更细致的审视下，事实已经清楚，这些言论只是提供一种更为肤浅的次要的合理化。我们最终从一个（*skinhead*）那里得到的解释是，打外国人让他觉得非常好，因为其他人的在场令他们不安。我们在这里其实是遇到了“本我-邪恶”（*Id - Evil*），这是由自我和原乐（*jouissance*）的不平衡所构成和驱动的大写的恶（*Evil*），是由于快感和在它最核心之处的原乐的异质性屈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产生。本我-邪恶在主体和他原初错失的欲望的客体成因关系之间形成了最基础的短路：在“他者”（*Jew, Japanese, African, Turk*）中“困扰”我们的是，他似乎试图保持一个对客体的特权关系——他者也拥有一个客体-宝藏（*object - treasure*），似乎就是他从我们这里抢走了它（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它），或者说，他们对我们对于客体的拥有制造了威胁。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引用黑格尔式的“无限判断”（*infinite judgment*）。暴力性的当下的“无用性”和“过度性”的爆发（出奇地）具有思辨意味的同一性，在社会的全球的反身化（*reflexivization*）中，那些暴力什么都没有揭示，却只展现了一种纯粹的赤裸的（“*non - sublimated*”）对他者性的仇恨。也许这种巧合的最终例子就是精神分析解释的命运。无意识的形成（从梦的机制到歇斯底里症状）已经肯定地失去了他们的“无辜”，并且彻底的反身化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分析者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s*）就包括了他们对自己的不安给出精神分析的解释的意图。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我们不仅仅有荣格派、克莱恩派（*Kleinian*），和拉康派的...也就是说，现实就已经存在着一些精神分析理论的隐性参考。这种解释的全球性的反身化（一些都在变成解释，无意识解释自己）就是为什么分析者的解释本身失去了它的表演性的“符号有效性”，并使得症状原封不动地在它的白痴性的原乐中留存。

那么，在怎样的意义下，那个从象征界中被排除的能指能在实在界中回归？想想口头幻象（*verbal hallucinations*）：他们很大程度上是象征界的，并且在寻常的意义的层次，他们完全可以被（精神病的）主体所理解，所以，我们必须重复这个问题，在何种意义上它们回归实在界？我想，两个相互关联的特征可以证实它的回归：孤立（*isolation*）和确定（*certitude*）。在它们不“存在”的严格意义上，它们被主体排除：他们绽存（*ex - sist*），坚持，并将自己强力性地排除在象征肌理之外。它们被孤立象征语境（*symbolic context*）中，并且通过对于信任和假设的定义，和那种拒斥背景中可能的缺席的在场所依赖的语境，（这意味着），每一个确定性总是与一个可能的质疑一同产生，并且最终确定性的意义只能依赖于对象征秩序的无条件信任和一种基础赌注。^{*比如}

在宗教仪式里，一个人可能并不了解上帝，但他冒险地相信祂，信任祂。相反的，精神病人的想法却就像是斯洛文尼亚的朋克乐队——卢布尔雅纳一样。在一次关于他们和上帝的关系的采访中，他们通过提及每一张美元纸钞上都印着的“我们信奉上帝”（“*In God we trust*”）来指出：“像你们美国人一样，我们相信上帝存在，但是，不像你们的是，我们并不信任祂”。或者，就正如 Balmès 简洁地指出的那样，精神病人并不相信（*believe in*）他们听到的声音，他们只是相信

1

(believe) 它们。¹ 这就是为什么精神病患者对他们听到的声音有绝对的把握：他们并不信任（trust）它们，他们当然把声音当作想要伤害他们的恶魔；但是他们仅仅相信着，这个声音是实在界的——这种绝对的确定性本身就使得它是实在界的。

*：原文此处定语从句层次不清，此处译者自己分层意译了，为避免误导，此处贴上原文：They are isolated from their symbolic context, which is by definition one of trust and supposition, the context in which every presence aris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ts possible absence, every certitude is accompanied by a possible doubt, and in which one ultimately has to rely on a basic wager to trust the symbolic order.

沧海